

“先秦两汉赵国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省历史学会主办、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先秦两汉赵国历史文化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9—30日在邯郸学院隆重召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河北省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保定学院、衡水学院、许昌学院、邯郸市文保所、博物馆、邯郸职业技术学院、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会议共收入论文70篇,主要围绕先秦两汉时期赵国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现从八个方面概述如下。

一、赵文化特质与风俗研究。段宏振《论赵文化的形成》从赵文化的研究历程、孕育、初步形成、正式形成、独特性等方面论述了赵文化的形成。认为考古学的材料可以反映出赵文化的独特性。董林亭《先秦燕文化与赵文化特征之比较》认为秦时期的燕、赵两国,因地域相接,两国在文化类型上有颇多相似之处,但燕文化与赵文化在地理环境、文化源头、学术思想、民风习俗等方面都存在着差别。冯小红《先秦赵国代地民风研究》认为先秦赵国代地的“剽悍”民风表现出一种“尚武”的侠义精神,在赵文化所及的地域范围内独树一帜。代地的剽悍民风缘起于北方少数民族的强悍本性。进入战国后,由于赵武灵王在代地推行“胡服骑射”,其民风的剽悍特征不仅未被削弱,反而得到助长。宋燕鹏《略论先秦赵国祠神信仰之内容》认为先秦时期赵国祠神信仰的主要内容有霍太山信仰和三神祠。先秦时期赵国祠神信仰以自然神为主,处于民间信仰发展的初级阶段。顾乃武《黄河与先秦两汉赵国风俗之形成关系探微》认为先秦两汉时期赵国地域在黄河水患的长期影响下,不事农商、重末技、尚侠为奸及文雅乏陈成为赵国风俗文化的主要内容。康香阁《〈战国策〉中赵国成语典故研究》据74条成语典故分析了赵国的精神特质。

二、先赵历史研究。董林亭《大业非皋陶辨》认为大业和皋陶虽系同族,但实为两人。吕庙军《赵盾弑君问题发微》检讨了“赵盾弑其君”事件发生的必然性及其事情的真相,并作评论。杨金廷等《赵简子与孔子史迹述略》认为两人的关系从一定层面反映了春秋晚期政治思想的变化和冲突。

三、赵国军事研究。冯浩《春秋晋国赵氏宗族骑兵考略》认为春秋末期赵氏宗族的武装已经存在骑兵。随着骑兵部队的兴起,原来的车战逐渐被取代。赵氏宗族大力发展骑兵,使自身发展进入新的轨道。朱海双《试论春秋晋卿赵氏军事力量》从精兵强将、武器装备、尚武民风、严明军纪、军事战略眼光等方面进行论述。张重艳《平原君的性格与长平之战》认为平原君性格中既有因自身地位产生的骄傲之气,也有出于为国家利益着想、牺牲个人利益一面,但性格的缺陷使其在长平之战的决策中造成失误。冯金忠《战国秦汉时期赵地的兵文化》考察了战国时期赵国辉煌的兵文化及其鲜明的地域特征,以及在秦汉时的衰落。魏建震《战国赵国军事思想与战争指挥艺术》对赵奢的“用众”思想、荀子的兵要思想进行了论述,并对赵奢在阼与之战、李牧在破匈奴之战中的指挥艺术进行了分析。赵生泉《由涿鹿所出春平侯铍看秦灭

燕、代之战》利用涿鹿新发现的春平侯钺并结合文献资料,对秦灭燕、代之战的过程进行了研究。芦会影《铜马军的赵地渊源考》指出,新莽时期河北农民起义军的一支铜马军,其名称中的“铜马”并非山川土地之名,名称来源带有明显的赵文化特征。

四、赵国官制研究。曹迎春《略论赵国的置相外交》认为置相是赵国在赵武灵王后期和赵惠文王初期的一种重要外交方式。邵育欣《赵国封爵制度若干问题研究》认为,当时的赵国已经建立起一套封爵制度,主要分君、卿、大夫三级,而每一大级中的爵位又有不同的等级。

五、赵国历史地理研究。后晓荣《赵国置县考》据赵国兵器铭文和玺印考古资料,考证出战国时赵国县有27个,加上传统典籍记载中的4个,共计31个县。陈瑞青《战国两阨与城考辨》针对秦赵阨与之战的阨与地望三说进行考辨,否定阨与地望武安说,提出战国时期并存韩、赵两个阨与城,一在今山西沁县,一属今山西和顺。张润泽《先秦赵国武安城考略》从文献、考古方面论证了战国武安地望问题,并分析了阨与之战、武安封君与赵国武安的关系。程动田《〈史记·货殖列传〉所载“漳河之间”考》认为,“漳”是指漳水支流的南易水,即今洛河。乔凤岐《赵国南长城的修筑因素探析》认为赵国与魏国形成了大致以漳水为界的边境线,赵肃侯沿漳水修筑长城守卫南部疆域不仅是出于防御来自魏、韩等国的军事入侵,同时也是出于称霸诸侯的需要。贾丽英《秦汉简反映汉初赵国属郡及南部边界问题二则》认为汉初张氏赵国的属郡应为五个,而不是传统所认为的三个,此五郡均从秦帝国承袭而来。汉初赵国的南界应较大幅度北移,相应的疆域也比原来认识的缩小约五分之一。陈辰《秦汉时期邯郸的地理环境与交通》从秦汉时期邯郸地区的地理位置、地貌、河流、气候、矿产和生态环境等方面的情况,分析了形成邯郸交通特点的地理环境因素。

六、赵国文物与考古研究。何艳杰《关于战国赵国墓葬研究的几点看法》认为随着内蒙古地区、河南北部地区大规模墓葬群的不断发现,战国赵国墓葬研究范围日益扩大,其中心区域不仅包括以晋阳为中心的山西地区和以邯郸为中心的河北中南部地区,而且应该关注云中郡统辖区和中牟统辖区这两个墓葬较为集中的地区。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法必将为赵国墓葬研究带来新的启迪。王静《赵王陵葬玉试析》对1997年赵王陵出土的玉片与汉代的玉衣片进行了研究。郝良真《居延汉简所见邯郸铍》认为居延汉简中所记载的“邯郸铍”,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说明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从兵器为主到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关于永年境内的朱山刻石研究,秦进才《群臣上龔刻石年代述论》对群臣上龔刻石自发现以来六种观点的优劣得失进行分析,并从赵国兵器铭文纪年方式、西汉上寿习俗、王国纪年类型等方面着眼,收集资料加以补正,把群臣上龔刻石的年代具体确定在汉文帝后元六年、赵王遂二十二年。而宋涟圭《猪山刻石年代“赵武灵王说”辨正》一文却认为“赵武灵王说”更贴近事实。

七、赵国乐舞研究。李润生《先秦赵国乐器浅谈》认为先秦赵国乐器无论是种类、律制规定,还是演奏技巧等方面,都具有较高水平。据出土文物、典籍材料可将赵国乐器分为打击乐器、管乐器和弦乐器三类。王冉《先秦时期赵国舞蹈艺术风格初探》认为先秦赵国舞蹈艺术逐渐形成浑厚豪放、刚柔相济的地域性风格。李傲雪《邯郸倡的界定及特征研究》认为邯郸倡是有着明显地域性和独特特点的艺人群体,他们多出自赵、中山风俗区,并有着出身低贱、以“游媚富贵”为职业特点、以“弹弦跼蹢”为艺术特点的共同特征。王文涛《试论以赵国为代表的汉

代河北乐舞文化》指出,乐舞是汉代赵国、中山地区的民众和权贵们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并考察了赵国、中山地区女乐对当时政坛、社会风尚和乐舞艺术的影响。

八、荀子研究。王丽萍《近十年荀子研究回顾与展望》从荀子的比较研究、礼法研究、政治哲学研究、教化以及语言学研究等方面简要回顾了2000年以来荀子研究情况。崔冠华《〈荀子〉引〈书〉辨析》认为《荀子》引《书》方式有直接引《书》、化用《书》中句式以及引《书》史实等方式。其特点是涉及《书》篇范围广、集中引用《周书》内容以及引议结合等特点。王俊才《荀子天人说新解》认为,荀子并没有强调人定胜天,而只是突出人的能动性、主动性,强调人类可以尽其所能了解、认识、适应、利用和改造自然。

研讨分两个组进行紧张而热烈的研讨,特别是采取双评议的学术讨论方式,由发言人陈述论文,评议人点评。在论文评议中,互评双方代表针锋相对,不留情面,对青年学者是一次很好的学术训练,保证了学术研讨的深度和质量。本次研讨会研究成果无论深度、广度都很大提高。正如河北省历史学会会长孙继民会议总结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料运用上,出土石刻、简牍以及兵器铭文的大量使用,使赵文化研究更加深入细致,也代表了今后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邯郸学院历史系 张润泽)

第二届甘肃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1年8月24日至26日,由甘肃省文物局主办,甘肃省简牍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和西北师范大学承办的第二届甘肃简牍学国际学术研讨会顺利召开。为加强学术交流,推动西北秦汉简牍的保护、整理与研究,本次会议内容主要讨论一个世纪以来出土简牍帛书在学术文化史上的地位以及保护整理研究展示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此次会议邀请了包括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中国台湾地区、香港、澳门、中国大陆等地的150多名学者参加,共收到120余篇会议论文,包括简牍的使用、出土及研究的相关历史,秦汉简牍的学术及文化价值,国内外对各地简牍的研究现状,楚简、吴简、晋简及帛书有关问题的研究,简牍帛书的科技保护与收藏展示等多个主题。

一、现今简牍学领域研究发展动向。当前的简牍学研究,在继续深入发掘上世纪以居延汉简为代表的简牍所蕴含历史信息的同时,研究领域扩展至楚简、三国吴简、清华简、北大简、浙大楚简、港大简牍,等等。西北汉简主要以社会史为主要研究方向,楚简主要以出土典籍为主要方向,秦简主要以日书等为代表。

二、会议主要研究成果介绍。(一)本次会上,著名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李学勤先生作了《清华简关于秦人起源的几个发现》的大会专题发言,主要介绍了清华简的收藏情况、最新整理成果的公布及秦人的起源问题,并认为简牍学研究开始步入“黄金时代”。他并结合自己在